

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

——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

ZHIDUBIANQIAN
YU
JIEGOUBIANDONG

SHANGHAI
CHANYEJIEGOU
HELIHUA
YANJIU

沈玉良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

——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

ZHIDUBIANQIAN
YU
JIEGOUBIANDONG

SHANGHAI
CHANYEJIEGOU
HELIHUA
YANJIU

沈玉良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

ZHIDUBIANQIAN YU JIEGOUBIANDONG

——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

SHANGHAI CHANYEJIEGOU HELIHUA YANJIU

沈玉良 著

责任编辑 郑 金

封面设计 未 名

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	
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	
装订	850mm×1168mm	1/32
开本	6 插页:4	
印张	155 千	
字数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	1—3 000	
印数	ISBN 7-81049-213-6/F·165	
书号	13.00 元	
定价		

序

上海正经历着一场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这种转变的表现是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以及与制度创新相关的结构合理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复杂的、艰巨的,它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更为重要地,它还是人们利益重新配置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沈玉良的新著《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出版了,此书的特点是:第一,从理论上修正了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研究的假设前提,作者认为,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制度(或规则)是产业结构变动的内生变量,不同的制度安排,产业结构运行的轨迹可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本将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的专著;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是各产业主体利益的再分配,因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不能使用休克疗法,只有在新制度逐步建立并得以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结构合理化调整才有效率;第三,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思想指导下,作者着重对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进行了典型分析,即以上海的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变动为模本,探讨上海制度变迁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实现机制、实现方式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设想。

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理论界对产业结构研究的深化,使我们不再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

研究内含到研究方法作重新调整,只有这样,理论为实践指导的方向才能正确。期待本书能为实践工作者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鉴于以上对本书的评价,我们欣然为本书作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晖明

中国纺织大学管理学院 陈荣耀

1997年12月

目 录

1	导言——结构变动中的制度因素	(1)
1.1	理论、经验研究的历史回顾	(1)
1.2	经济增长、结构变动与制度变迁	(6)
1.3	产业结构的研究方法	(14)
1.4	本书的分析框架	(16)
2	传统经济制度安排下的产业结构变动 (1952—1978)	(19)
2.1	传统经济制度安排	(19)
2.2	传统经济制度安排下的结构效应	(22)
2.3	传统经济制度安排下的结构效率	(26)
3	制度变迁与上海产业结构的演变	(29)
3.1	阶段划分的依据	(29)
3.2	放权让利下的结构变动(1979—1984)	(30)
3.3	产业政策制定下的结构变动(1985—1988)	(32)
3.4	承包制安排下的结构变动(1989—1991)	(34)
3.5	要素市场全面启动下的结构变动(1992—1996)	(36)
3.6	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下的结构变动 (1997年9月至今)	(38)
3.7	经验的总结	(39)

4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制度安排	(49)
4.1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判断标准	(49)
4.2	不完善市场下的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	(53)
4.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制度安排框架设计	(61)
5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实现机制	(64)
5.1	协调机制的再研究	(64)
5.2	协调机制摩擦与效率损失	(67)
5.3	宏观产业协调机制的建立	(69)
5.4	企业协调机制的培育	(75)
6	制度变迁与就业结构合理化实现方式	(82)
6.1	传统制度安排与就业结构的非合理性	(82)
6.2	政府职能转换:就业结构合理化的前提	(86)
6.3	教育培训制度变迁:就业结构合理化的关键	(88)
6.4	就业结构合理化的制度环境	(94)
6.5	浦东开发与农民转业问题研究	(98)
7	技术创新与结构变动	(108)
7.1	技术变迁对结构变动的制度解释	(108)
7.2	技术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的经验研究	(113)
7.3	技术制度重新安排下的结构效应	(116)
7.4	开发区制度安排下的结构变动效应	(121)
8	金融制度创新与资产结构变动	(129)

8.1	制度变迁与资产结构变动	(129)
8.2	资产结构合理变动的微观制度基础	(132)
8.3	资产结构合理变动的宏观制度基础	(138)
8.4	财政、金融制度安排对产业的扶植与援助	(142)

9 制度变迁与中小企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	(147)
9.1 中小企业产业结构特征:低度化、分散化	(147)
9.2 中小企业的产业调整方向	(154)
9.3 制度安排:机构的设立与政策的制定.....	(159)
9.4 中小企业中介组织的培育	(165)
9.5 结论	(167)

10 政策性建议

附录一	有关制度安排和法规	(172)
-----	-----------------	-------

附录二	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176)
-----	---------------------------	-------

附录三	上海市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数和各产业 就业人数	(178)
-----	------------------------------------	-------

参考文献	(179)
------------	-------

后 记	(183)
-----------	-------

1 导言——结构变动中的制度因素

产业结构受诸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供给、自然资源、技术条件等,但这些因素背后大都受到制度安排的约束,在产业结构的研究中,与其说将制度作为既定的条件,不如说人们对制度安排在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作用认识不够,通过笔者的分析,相信人们将改变传统的看法,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作用也将重新得到定位。

1.1 理论、经验研究的历史回顾

关于产业结构的含义,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产业理论的创始人科林·克拉克(C. G. Clark)的影响,他认为,产业结构是劳动力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简单组合。^①实际上,随着现代经济的成长,劳动力只是投入要素的一个方面,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对产值结构变动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投入要素之间也经常发生替代作用。因此,笔者认为,产业结构是指投入要素结构之间以及由投入要素结构引起的产值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总和。

关于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一种方法是利用国家之间的横截面资料或某些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从统计上分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存在的一般规律。

1935年,费雪(A. G. B. Fisher)在《物质进步的经济含义》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并在随后的《初级、第二、第三

产业的生产》中分析了三大产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规律。^②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1940)一书中论述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将从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转移。

库兹涅茨(S. Kuznets)是第一位对经济结构作系统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在《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和《现代经济增长》(1996)等著作中,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核算的主要成分进行了国际间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结论是:第一,从时间、空间角度对配第、克拉克所论述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得出了农业部门不论在GNP中所占份额,还是在总劳动力中所占份额都趋向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份额却趋向上升的结论。第二,首次对工业内部结构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作经验研究。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库兹涅茨认为,在制造业内部,与现代制度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增长最快,而且这些部门在GNP和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趋于上升;在服务业内部,教育、科研和政府行政部门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也趋于上升。第三,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在变化的。变动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人均GNP的提高必然推动需求结构的变动,这样就要求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作相应的变动;二是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变化。第四,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除了由需求结构的高变换率引起以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对外贸易,二是技术革新的高速度及其扩散。发达国家对外贸易比重的上升,可能是这些国家国内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的主要原因。^③第五,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出现可持续增长,主要是产业结构变动缓慢,而产业结构缺乏高变换率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因素,库兹涅茨明确指出:“生产要素流动性和生产要素报酬均等化受到制度的阻挠。”^④这说明,库兹涅茨已经认识到了制度结构的变革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但他没有作展开分析。

钱纳里(H. Chenery)及其合作者对经济结构的研究相当出

色,⑤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吸收库兹涅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动力源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经济结构不仅受制于内部因素,也受制于外部因素,如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目标以及国际资本、国际先进技术和国际贸易环境等等,但经济结构变化的动力源是人均收入的变化,且两者之间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是无法确定的。

为了对经济结构变化的规律性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钱纳里和塞尔昆(M. Syrquin)在《发展的模式,1950—1970》(1975)一书中,根据101个国家(地区)20年的统计资料,运用30个变量,对2万多个统计数据进行测算,成功地分析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共同经历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格局。钱纳里等对所有经济结构变化模式的估计都采用下列半对数回归方程:

$$x = \alpha + \beta_1 \ln y + \beta_2 (\ln y)^2 + \gamma_1 \ln N + \gamma_2 (\ln N)^2 + \varepsilon F \quad (1.1)$$

式中: x ——因变量,它用比重来表示有关的经济结构;

y ——以不变价格计算出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

N ——总人口;

F ——净资本流入;

T ——时间;

$\alpha, \beta_1, \beta_2, \gamma_1, \gamma_2, \varepsilon$ ——系数。

从式(1.1)中我们可以看出,钱纳里模型中人均收入水平和总人口在结构变化中起关键作用。

第二,对经济结构的外延作扩充,他们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包括生产、需求、贸易、资源使用和人口等方面的结构变化,而且包括城市化和收入分配等过程的变动。

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1986)中,钱纳里及其合作者S·鲁宾逊(S. Robinson)和M·塞尔昆进一步发展了“发展模式”的理论、方法。钱纳里及其合作者除了分析影响工业化进程的各种因素外,对39个国家(地区)总量增长因素的索洛模型估计

结果作了比较研究和 9 个国家(地区)的多部门模型研究,概括出了外向型、内向型和中间型工业发展模式。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钱纳里模型暗含的假设前提是市场经济制度,它没有涉及到类似转轨时期中国制度变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研究的第二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及经济制度相似的一组国家(如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化和结构高度化进程,结构高度化是指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业演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研究的是阿瑟·刘易斯(W. A. Lewis)。^⑥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一是现代部门。在传统部门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零售业和传统服务业,这些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是零或负数,并存在着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在现代部门,如现代高科技工业、现代贸易业、高效农业和现代金融业等,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就业人数较少。刘易斯认为,现代部门使用劳动和资本要素创造利润,传统部门的产品只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的需要,这些部门既不是为了创造利润,也不能形成利润。

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呢?刘易斯认为,通过现代部门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来自利润的再投资,利润又来自对剩余劳动的有效利用,要使资本积累加快,必须使国民收入中利润或储蓄的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迅速提高,其具体方式一是保证利润再投资,二是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样,就可以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量的增加。显然,刘易斯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结构高度化进程的看法和结构高度化所采取的措施过于简单,但这毕竟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的开拓性研究。

后来,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刘易斯的双元结构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⑦他们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资本积累、资本与劳动配置比例、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工业化实现方式,一种是资本深化的工业化方式,其特征是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资本存量的增长,技术创新的劳

动力使用偏向很小,从而部门资本与劳动的比例较高;另一种是资本浅化的工业化方式,其特征是在工业经济增长率足够高的前提下,技术创新的劳动力使用偏向较强,从而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较低,从这一点出发,费景汉和拉尼斯将二元经济的发展划分了三个阶段,通过现代工业部门从资本浅化到深化的发展,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消失。

中国对产业结构的分析是很晚的事情,1985年杨治在《产业经济学导论》中介绍了西方的产业结构理论,由于当时宏观结构严重失衡,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作了有益的探讨,比较有影响的有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共18本,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变动。以后,中国经济学界又发表和出版了一些专门论述产业结构的论文和著作,如刘伟、杨云龙合作完成的《中国产业经济分析》(1988),吴仁洪的《中国产业结构动态分析》(1990)^⑧等等,他们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作了描述性分析,并提出了中国近、中期的产业结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的舒元教授撰写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1993)搜集了我国有关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资料,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换的不同特点,这是一本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又使许多中国学者将笔墨转向区域性分析,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城市,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上海产业结构在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严重失衡。为了走出结构失衡的困境,上海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80年代以后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于祥年主编的论文集《上海产业政策研究》(1988)一书,提出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但当时的研究一方面缺乏系统性,另一方面重历史分析,轻发展导向分析,因此,研究只停留于史料的堆积,对结构变动中的内在机理缺乏分析。

第一次对上海产业发展作系统性分析的是笔者的《上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⑨该书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和发展战略作了阐述：第一，描述性地分析了上海产业结构的演变，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计量分析方法对上海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高度化作了量化分析，并分析了这段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动效率；第二，首次对上海产业结构变动中的矛盾冲突作了全面分析，这些矛盾冲突是：城市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与上海产业结构均衡性之间的矛盾，产业结构变动中要素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的矛盾，结构变动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矛盾等等；第三，对上海产业结构与其他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作了分析，说明了其他经济结构变动对上海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第四，对上海产业结构政策效果作了客观评价，分析了上海 80 年代实施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实际效果同预期效果之间存在着较大偏差的原因。笔者认为，80 年代上海对产业结构调整所需配套的制度性供给缺乏设计或不能及时推出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但笔者在那时没有作详细的展开分析。

从上面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到，过去的产业结构研究绝大部分属于经验研究，并常常以制度不变为假设前提。而在中国制度大变迁时期，有必要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动。

1.2 经济增长、结构变动与制度变迁

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动之间相关关系研究的文献颇丰，人们对经济结构变动所带来经济增长的认识也趋于一致。

经济增长一词看来简单，实际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看法不一，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进行定量分析时，碰到了一系列的困难，笔者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有许多，但概括起来讲有两种，即要素投入增长率和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指在不追加投入要素情况下引起的经济增长，这主要通过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结构变动来实现。以

要素投入增长率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我们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反，以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各国的经济增长表明：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的。

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变动。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而带来的人均 GNP^⑩的增加，消费者的需求量将发生变化，根据恩格尔法则，由于人均 GNP 的增加，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将下降，而在工业品和劳务方面的支出比重则相应上升，这意味着整个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动，需求结构的变动必然诱使供给结构的变动，从而带来其他经济结构的变动，这种情况在人均 GNP 为 500 美元~1 000 美元时尤为突出。^⑪当然，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还有许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动，必然推动经济增长，若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与国内外需求结构基本相吻合，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基本相适应，主导产业又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则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将能保证总量的持续增长，即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支撑力，相反，若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国内需求结构的相关性较弱，产业发展中又没有明显地代表未来发展并且对整个产业能带来联动效应的主导产业，那么，经济增长将不能带来持续稳定。

产业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市场分割，非均衡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因而同增量投入相比，资源的再转移和再配置成为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增长因素，结构变动的潜力更大。^⑫

因此，我们认为，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结构变动，只有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高转换率（在市场拉动这一前提下），才能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制度安排和变迁对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呢？

首先，我们对制度结构及其功能作分析，然后分析制度安排和

变迁是如何对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产生影响的。

制度是一个社会消费者、厂商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也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⑬从上面的定义中我们将制度结构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就有不同的制度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第二,惯例和规则是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惯例是习俗所约定的,因而同特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变迁密切关联,而规则则是由具体的经济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等)制定的,因而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并主要从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组织安排和政府政策中得到体现;第三,制度结构的内容是对财产权的界定,而交易成本则是财产权界定中的费用支出,因而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第四,“维护和施行制度意味着某种‘外在’权力或权威的存在,国家则是这种权力的典型”;^⑭第五,制度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

西方新制度学派所分析的制度变迁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实际上前者属于宏观制度学,后者属于微观制度学。西方学者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我们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研究制度变迁的侧重点从微观方面看是公有产权制度的变迁,即公有制框架下产权制度的重新安排;从宏观方面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框架下具体制度如金融制度、就业制度等的重新安排,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微观制度是基础,宏观制度是微观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如在国家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安排下,政府只有通过指令性行政计划的方式才能实现对微观的有效控制。

制度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迁,制度变迁即在原有或既定制度下的新发展,这种变化可能是根本性的,如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根本性的,它是在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如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我们的分析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如

公有制)的制度变迁,即计划向市场转轨而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有两种形态:即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影响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因素有三个,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提高特别是因上面两个因素引起的“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会导致它们对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评价的全面修正。”^⑤也就是说,市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市场的拓宽和交易量的扩大,没有必要的制度,就势必引起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和搭便车行为。以企业制度变迁为例,生产技术对制度变迁的效应是技术变迁使产出在相当范围内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这样,古典式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而为一的企业制度安排就不能适应技术变迁要求企业有规模效应而日益扩大企业的需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运而生,这样,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率的、较为发达的层级组织来取代过去个人企业的简单层级组织,企业的行政协调机制往往无法替代市场机制的功能,资源配置因此将处于程度不同的体制真空状态,以致已经扩大的企业因效率降低而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合而为一的决策机制必然产生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使某些人通过控制信息、扭曲信息等手段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

但诱导性制度变迁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全面供给。因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个人之间、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造成制度供给的不足,或者即使推出了,但推出所需时间太长,所花成本太高。这样,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法律等方式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创新过程包括下面的四个过程:第一过程是理论上的酝酿、探讨以及对现有制度的认识,如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在